

报国一生拓荒人

——晚清爱国华侨、学者容闳

清同治年间，政府曾计划选派4批共120名中国学童赴美国留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公费留学生。当时，由于世俗的偏见，许多父母都不放心学童远行，更担心出洋学习的前景，而在与西方文明接触较早、思想较开放的广东，竟有85人应征。广东籍幼童在这批留学生中所占人数最多，这些人才日后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影响甚大。在他们中间，包括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香山人唐绍仪、中国第一个铁路工程师南海人詹天佑、一度出任民国外交总长及交通总长的顺德人梁敦彦、海军将官香山人蔡廷幹、清华学校校长香山人唐国安等。倡议和主持这次招生赴美留学，揭开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新一页的是我国第一个留美大学毕业生容闳，他也是广东人。

容闳，原名光照，字达萌，号纯甫。清道光八年（1828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乡（今珠海市南屏镇）一个贫苦农民家中，父亲容丙炎以渔农为生。此地距澳门近在咫尺，同外商有更多接触机会，一些人家的子弟当了买办发了财。容闳父亲希望他长大了能当买办，尽管他排行第三，家境贫寒，在他将近7岁时，父母还是把他送进澳门一家教会学校就读，接受启蒙教育，学习英文。两年后，学校解体，他又重习汉文，道光二十年（1840年）其父去世。他不得不协助母亲挑起家庭重担，开始和兄姐一起参加劳动，12岁即到澳门一天主教印刷厂当童工。过

了两年，入美国人塞缪尔·布朗办的马礼逊学堂读书，不久随校迁至香港。容闳天资聪颖，向得老师喜爱。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初，容闳志愿随退休的布朗校长夫妇赴美留学。一起前往的同学有黄胜和黄宽。

在香港、广州的洋商、外侨赞助下，他们三人得以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攻读大学预科。两年以后，容闳考取了著名的耶鲁大学。胸怀报国之心容闳，拒绝了孟松学校以毕业后当传教士为条件的资助，大学四年，他除了从佐治亚洲的萨瓦纳妇女会以及纽约的阿利芬特兄弟公司处得到一些资助外，经济来源靠着管理一所寄宿公寓以及为一个文化团体经管图书。生活贫困使他更加勤奋，大学二年级时，连续两次得到英文习作奖金。咸丰四年（1854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大学期间，他加入了美国籍。容闳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尽管长年学习生活在海外，但是时刻眷恋着祖国，没有忘记养育他的母亲，毕业的当年，就毅然返回中国。

回国后，容闳先是担任美国驻广州领事派克的书记，兼香港高等审判厅的翻译。此时正赶上广州天地会起义失败，两广总督叶名琛大开杀戒，容闳目睹广州刑场血流成河，道旁无首之尸纵横遍地的惨状，对清政府的腐败残忍十分反感，寄希望于方兴未艾的太平天国。次年，咸丰六年（1856年）八月，容闳到了上海，充任海关翻译，后到经营丝茶的宝顺洋行当买办。

咸丰十年（1860年），为了了解太平天国是否有可能取代清政权，容闳应两个美国传教士之邀一起到太平天国天京（今南京）实地考察访问，在天京，容闳会见了在香港结识的旧友、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他向洪仁玕提出七条建议，包括组织新式军队，创立银行，将“圣经”列入学校主课，设立军事学校、实业学校等，洪仁玕虽赞赏这些建议，但限于条件无法实施。容闳细加考察，看到太平天国革命还含有宗教和游民的落后性、破坏性

的另一面，他对太平天国领袖人物的行为品格及所筹划有所怀疑，于是谢绝了太平天国封他的四等“义”字爵位，返回上海，从此，他为实现自己培养通晓西方文化科学知识的人才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主张而不辞劳苦，四处奔走。

同治二年（1863年）九月，容闳应邀到了曾国藩大营。曾国藩为了兴办洋务，广聘人才，而他创立的军械所正亟需机器，容闳建议他创办机器厂，旋受命赴美购置机器，建成江南机器制造局。他还向曾国藩建议，在江南机器制造局旁附设了兵工学校，设立了译书部门。容闳被保奏授予五品实官，在江苏省衙署任译员。

容闳深信只有教育才可以救国，他向清廷提出计划，每年选送一批30名12—14岁的幼童出洋留学，4年共120名，学习期15年，费用从海关收入中拨出。这个方案于同治十年（1871年）经御旨批准。由于在上海招收不到计划人数，容闳又亲自到广州招录留学幼童。因此，这4批总共120名学童中，大部分选自广东，而且大多来自香山、南海二县。首批留学生于次年夏启程赴美，容闳任中国留学生事务所副监督，清廷同时任命守旧官僚陈兰彬任监督，以约束容闳。同治十二年（1873年），容闳曾被清政府派往秘鲁调查华工在当地受虐待情况，使80名华工在该国获得人身自由。同治十四年（1875年），容闳与新西兰的玛丽·卢萨·凯洛格结婚。光绪四年（1878年），清政府在美国建立第一个公使馆，陈兰彬、容闳分别任正、副公使，此时，容闳为二品官。由于陈、容对留学生接受西方教育的意见相左，陈兰彬不断向清朝奏报说学生行为不端，造成朝野对留学生不满。光绪六年（1881年）六月，清廷不顾容闳反对，下令撤销留学生事务所，全体留学生及教师奉召回国。120名留学生中，除因故辍学外，当时尚存94人，仅有詹天佑、欧阳赓二人大学毕业，其他人正在读大学、专科学校或中学。尽管学业多未完成，但他们将

所学到的科学技术知识带回中国，成为中国近代工业与技术方面第一批专家，成了中国现代化启蒙运动生力军。其中不少人成为中国近代杰出的人才。据统计，他们中有包括舰队司令的服务海军者 20 人，包括天津北洋大学堂、清华学堂校长的从事教育者 5 人，包括六名工程师的从事铁路、电报、工矿事业者 30 人，包括内阁总理、外交总长、次长、驻外公使、领事、代办的政界、外交界任职者 24 人，包括上海华商银行行长、江汉关监督的从事金融商业者 7 人，对中国近代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容闳回国以后，曾谋求复职未得到满意的职位，再度返回美国居住。但他仍然关注着祖国的安危。清光绪二十年（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容闳立即写信给南洋大臣张之洞的幕僚蔡锡勇，建议向英国借款买军舰雇外兵，夹攻日本。张之洞委他为特使往伦敦借款，而清府已战败求和，借款计划作罢。容闳应张之洞之邀又回到中国，但是，他提出创立国家银行、组织铁路公司都无法实现。他认识到清政府已腐且朽，无可救药，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积极支持他们的维新变法活动。戊戌变法失败，他也在清政府通缉之列，流亡至上海租界，被上海维新人士推举为中国强学会会长。不久，他因支持唐才常“自立军”被严加通缉，不得不潜往香港。

容闳避居香港两年，这位 70 多岁老人在阅尽沧桑之后，更加看清了清政府的腐朽反动，也看清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企图，他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表示支持，认为孙中山“宽广诚明有大志”，寄希望孙中山，喻之为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这时，兴中会的谢纘泰、李纪堂等人在香港筹划壬寅（1902 年）广州起义，容闳与他们来往甚密，与闻起义计划，并被内定为起义成功后的临时政府大总统。为了使起义取得国际支持，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七月他又返回美国活动，不久，传来起义计

划失败的消息，容闳便留在美国。他坚持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联系，并从各方面予以有力支持。

容闳这次返回美国，临行最后一次返回南屏家乡。当年，他在广东招生赴美留学生时，“因思有以教其乡之人，务在教育子弟，造就人才，以备他日国家之用”，遂在本乡倡建学校，自己首先捐助白银 500 两，与乡人集资，创建了“甄贤社学”。这次返乡，他眼见社学日益扩大，学生已逾百人，甚感欣慰，于是再次招集乡亲商议将社学改为新式学堂，并建议在南屏屏岚园办一所中学，构筑校舍，方便南屏、北山、湾仔及澳门等地的子弟深造，他还亲手为岚园中学设计了一幅建筑蓝图。但因受不赞成西学的封建势力的阻挠，此议未能成果。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清政府迫于形势废除科举，甄贤社学才得以复议容闳主张，次年正式改名甄贤学校（又称两等小学堂）。乡民们推选侨居美国的容闳为名誉校长。在长达 100 多年的历史中，甄贤学校培养了众多的人才，这与容闳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是分不开的。

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当选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曾致函称容闳为对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建伟大事业，以还吾人自由平等幸福的老同志。邀其回国赞助共和政府，主持外交事务。他在准备起程时，却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民国元年（1912 年）4 月 21 日病逝于美国哈特福德，终年 84 岁。临终时还嘱咐两个儿子放弃在美国的职业，回国服务。其子遵从父命，归国分别任矿冶工程师、广州军政府军火局局长。容闳留给两位儿子的遗言是：“吾费如许金钱，养成汝等辈人材，原冀回报祖国。”这是一位爱国老人的金玉之言。梁启超评说容闳：“舍忧国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一位美国友人赞誉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河山和伟大的历史。”这些称誉，容闳是当之无愧的。

晚年的容闳，勤于著述，用英文写下自传《我在美国和中国的生活》（中译本译名《西学东渐记》）。他的译著有歌尔顿《地文学》、派森《契约论》等。

为了纪念容闳，上海交通大学于 1936 年特置铜匾一方，以他的名字命名一所礼堂。容闳创建的甄贤学校一度改名南屏小学，为了纪念容闳，1983 年，珠海市政府将南屏小学恢复“甄贤学校”校名，华侨爱国学者容闳的爱国精神，得到光大发扬。